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编

人文述林

第八辑

Renwen
shulin

山东大学出版社

人文迷林

(第八辑)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编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文述林. 第8辑/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编.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
社, 2005. 9

ISBN 7-5607-3103-1

I. 人…

II. ①山…②山…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7017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荣成三星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4.5 印张 361 千字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定价:29.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人文述林》编辑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 曾繁仁 陈 炎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龙潜 马瑞芳 王汶成

孔范今 刘晓东 陈 炎

张树铮 杨端志 郑训佐

郑 春 唐子恒 黄万华

曾繁仁

执行编辑 廖 群 李剑锋

目 录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从《左传》与《史记》称《诗》、引《诗》

的对比研究,看《毛序》的作期 王洲明(3)

考古发现与《论语》解惑(四则) 廖 群(20)

军旅生活和军事思想对曹操诗文的影响

——兼论建安诗风和士风变化的军事原因 李剑锋(31)

高适诗歌的“兴象” 孙学堂(40)

“西游戏”与《西游记》的传播 王 平(45)

南社与国粹学派 孙之梅(59)

《子笏》诗的作期与蒲松龄诸子的生年问题 邹宗良(74)

漆园之旷

——李渔《奈何天》的文化解读 徐爱梅(86)

浅议民初鸳鸯蝴蝶派的白话小说语体 黄丽珍(94)

《陆侃如先生论著译著年表初编》补遗 张可礼(106)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延安时期的丁玲

——《丁玲全集》阅读札记 解洪祥(109)

战时到战后台湾文学的转折 黄万华(135)

救赎与皈依: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审美现代性 叶诚生(146)

目 录

新世纪先锋小说论·····	牛守祯	张学军(159)
向死而生的智慧		
——废名小说解读·····	谢锡文	(167)
论方方的爱情悲剧·····	庞守英	(175)
史铁生与基督教文化·····	丛新强	(185)
申论:时代的写作·····	王 江	(207)
影视创作的价值失范:一种文化视角的批评·····	郑凤兰	(212)
影片《一声叹息》中的特写镜头分析·····	林 峰	(222)

审美文化研究

从精英美育到大众美育:		
两种美育范式的并存与共生·····	王汶成	(229)
从“道不远人”的中国文化精神		
看当代审美文化发展·····	仪平策	(242)
浅论徽州书院建筑的艺术		
特点与审美特征·····	臧丽娜	宫 强(256)
中西饮食文化比较初探·····	郭胜昔	(265)

外国文化与文学研究

文化研究与 20 世纪文艺学·····	张志庆	(278)
荆棘鸟的绝唱		
——评《钢琴教师》·····	耿建华	宋 颖(287)
《远大前程》:从小说到电影的转型·····	王同坤	杨延生(298)
《在流放地》:卡夫卡弑父意识的暴露·····	郭春英	(306)

汉语词汇研究

《训诂方法论》中的若干理论问题·····	杨端志	(319)
与书家商讨错别字问题·····	徐 超	(336)
论联绵词和音译词·····	鲍思陶	(345)

新时期同族词语的特点研究·····	杨振兰(357)
试论词汇的发展变化对语言系统的影响·····	贾宝书(372)
缩略语产生的原因和条件·····	郑阳寿(380)

新闻传播、网络技术及其他

“记者”一词的中国之旅·····	李开军(389)
简论范长江对我国新闻理论的贡献·····	王咏梅(397)
试论传播学的人学视角·····	李欣人(403)
浅析省级卫视频道的差异化定位·····	邱 凌(414)
网络信息资源的配置与增值·····	倪 万(422)
应用现代教育技术,促进新闻专业	
网络课程实验教学的现代化·····	许维江(429)
研究生社团建设探索·····	张桂珍(435)
治学研究 with 书目利用·····	刘晓多(441)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从《左传》与《史记》称《诗》、引《诗》 的对比研究,看《毛序》的作期

王洲明

《毛序》的写作时代和作者问题,是《诗经》学中的重要问题,也是自古以来《诗经》学中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围绕《毛序》作者、作期的不同意见至少有十几种之多。其中最为代表性的意见有四种:孔子弟子子夏所作、孟子学派所作、毛公与毛萁所作、卫宏所作。他们分别所处的时代为:春秋末、战国中、秦汉之交至西汉初年、东汉前期。应该说上述观点都有文献的根据;而反对者的意见也不能说都不成立。于是,有关《毛序》的问题形成了长期争论而最终也不能统一的局面。

笔者在接触了大量的相关《毛序》的资料之后,特别是详细研读了《上博楚竹书·孔子论诗》的竹简之后,认为对《毛序》的研究,是否可拓展一些思路:如鉴于先秦两汉(特别是先秦)的许多典籍如《论语》、《庄子》、《墨子》、《左传》等,都有陆续编辑而成的现象,鉴于先秦两汉(特别是先秦)著作权的概念并不明显的情况,将《毛序》的成书设想为有一个編集过程,将其放到《毛诗》流传的系统中,考察其作者和作期;又如,《毛序》毫无异议是体现儒家思想观念的一部文献,既然面对如此繁多、又如此矛盾的相关《毛序》的记

载,从《毛序》所表述的思想观念入手,与春秋末至汉初的思想观念的发展变化相比较,这对于确定《毛序》的作期,无疑是很有帮助的;再如,对于一部承载众多文化、思想的文献而言,确定其写作时代比认定作者更为重要,且确定了写作时代,对认定作者又必然有很大的帮助。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笔者选取了四个“坐标”分别与《毛序》所体现出的思想观念进行了比较研究,这四个“坐标”是:春秋时代的“赋诗断章”、上博楚简《孔子论诗》、孟子论诗以及毛亨、毛萁所作之《毛传》。所得出的基本意见为:“从先秦至汉初的《诗》学观念有明显的承继痕迹和呈现出阶段性:春秋时代‘赋诗断章’多用诗的象征意义;孔子、孔门弟子论《诗》,既重象征抽象的道理,又重政治教化作用;孟子一派注重联系史实寻觅《诗》旨;再到汉初沿袭并强化孔门一派重政治教化的《诗》学观,沿袭并强化孟子一派联系史实、寻觅《诗》旨的《诗》学观,从而更加追求《诗》的本事化和政治化。”“所谓‘编纂而成’,是说大毛公将‘国史’编《诗》时所作属于礼乐仪式上的规定,将自孔子以来孔门一派既重象征的道理,又重政治教化的‘诗说’,将孟子一派开始联系史实寻觅《诗》旨的《诗》说,将秦汉间人受孔、孟派影响,从而更加追求《诗》的本事化和政治化的《诗》说,当然也包括大、小毛公自己的见解,统统纳入代表自己《诗》学体系的《毛序》之中,使之成为以《诗》为载体体现儒家思想的一部经典。”^①

十分明显,笔者的结论是,起码在汉初《毛序》已经基本完成了。这就遇到一个问题,即如何看待卫宏作《毛序》的问题。《后汉书·儒林列传》言之凿凿:“卫宏,字敬仲,东海人也……初,九江谢

^① 参见拙文《上博〈诗论〉的论诗特点与〈毛序〉的作期》,载《山东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毛传〉与〈毛序〉的同异比较并论及〈毛序〉的作者》,载《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①（《儒林列传》卷七十九下）也正因为此，所以后世多有人从之。最近读到一篇《论〈毛诗序〉非一人一时所作》的文章，其思考问题的视野是很值得赞赏的，但其结论“《毛诗序》中涉及《左传》与《史记》的诗序，不可能是毛亨、毛萁所作，西汉偏晚的徐敖、陈侠、东汉时期的谢曼卿、卫宏等，当是《毛诗序》不断充实完善重要人物。”^②这个结论得出的前提，是《左传》为刘歆所伪造，《左传》许多史实根据《史记》。这涉及到《左传》的真伪、成书时代等问题。笔者认为，目前学术界占主导倾向的意见，即《左传》是先秦的、可资信赖的一部重要的典籍，而不是汉代刘歆伪造的观点，应该得到承认。如杨伯峻《〈左传〉成书年代论述》（载《文史》第六辑）、胡念贻《〈左传〉的真伪和写作时代的考辨》（载《文史》第十辑）、赵光贤《〈左传〉编纂考》（载《中国历史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第2集），对该问题都有详细论述和考辨。这篇短文不可能再详细讨论这个问题。但无论如何，该文的结论还是很清楚的，即《毛序》不可能在汉初就完成或基本完成，应该是西汉偏晚或东汉时代的产物。既然《毛序》根据了《史记》中的史实，那么，其完成就应该是在汉宣帝或宣帝以后的时代，因为《史记》直到汉宣帝时才公布于众。文章对我思考该问题有很大的启发，也即考察《毛序》只根据前面所立的四个“坐标”还远远不够，《史记》中称《诗》涉及《诗》内容方面的资料，应该而且必须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后汉卫宏作《毛诗序》的意见，也应该充分重视。

二

《毛序》论《诗》有几种固定的类型，如直接说明诗义，和联系史

① 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75页。

② 参见《论〈毛诗序〉非一人一时所作》，载《贵州文史》2003年第3期。

实论《诗》就是其中两种重要的类型。直接说明《诗》义的一类,在《史记》的称《诗》、引《诗》中没有反映;而在《左传》的称《诗》、引《诗》中,却能看出《左传》所用诗义与《毛序》说诗义之间的联系。这对考察《毛序》与《左传》的关系是至为重要的。

例一,《左传·襄公十五年》:“君子谓楚于是乎能官人。官人,国之急也。能官人,则民无觖心。《诗》云:‘嗟我怀人,寔彼周行’。”^①所引为《周南·卷耳》之诗句。该诗《毛序》曰:“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诌私谒之心,朝夕思念,至于忧勤也。”^②《左传》说“能官人”,而《毛序》说“求贤审官”,二者意义相近,其有内在意义上的联系是清楚的。

例二,《左传·文公七年》:“宋昭公将去群公子,乐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荫矣。《葛藟》犹能庇荫其本根,故君子以为比,况国君乎?此谗所谓庇焉而纵寻斧焉者。必不可,君其图之。’”^③《葛藟》见《王风》,其《毛序》曰:“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弃其九族焉。”《葛藟》诗云:“绵绵葛藟,在河之浒。终远兄弟,谓他人父。谓他人父,亦莫我顾。”^④《左传》所谓“君子以为比”,是取诗义“葛藟尚庇荫其本根,而兄弟却不能相亲”。而《毛序》由“兄弟不能相亲”,引申出“弃其九族”。也能看出其内在意义上的联系。此外,春秋中前期的乐豫明确说《葛藟》是一首歌谣民谚,证明了今人《诗经》一部分诗采集民歌而成的结论,也具有《诗经》学史料的价值,这当然是另外的问题了。

例三,《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⑤《唐风·蟋蟀》的《毛序》曰:“刺

①③⑤ 杜预:《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922、454、1121页。

②④ 孔颖达:《毛诗正义》,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9、64页。

晋僖公也。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之，欲其及时以礼自虞乐也。此晋也，而谓之唐，本其风俗忧深思远，俭而用礼，乃有尧之遗风焉。”^①《左传》载吴季札对《唐风》的评价是“有陶唐氏之遗民”，“何忧之远”；而《毛序》则说“其风俗忧深思远”，其中存在内容上的联系也很明显。

例四，《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伯有赋《鹑之贄贄》，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阂，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②《鹑之贄贄》见《邶风》，其《毛序》曰：“刺卫宣姜也。卫人以为宣姜鹑鵲之不若也。”^③联系杜注：“卫人刺其君淫乱，鹑鵲之不若也”，“此诗刺淫乱，故云床第之言”，可见，伯有虽为赋诗，但所取诗刺淫乱之义无疑，同样可以看出《左传》所用诗义，与《毛序》义存在有内在的意义上的联系。

诚然，《左传》的称《诗》、引《诗》，是基于特殊场合下的产物，不可能是对《诗》义的直接说明；但通过与《毛序》的比较，仍能发现其在内容上、文辞上有因果的关系。这些材料证明，《毛序》的作者不可能没有见过《左传》。

三

《毛序》的确有联系史实论《诗》的特点。所以围绕《毛序》论《诗》所联系史实的出处，即是说，究竟是根据的《左传》还是根据的《史记》，对确定《毛序》完成的时代，应该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若《毛序》在汉初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那么其论《诗》所联系的史实，应主要根据《左传》，当然也还有其他的典籍；若《毛序》完成于西汉偏晚或东汉时代，那么，其论《诗》所联系的史实，应该主要根据《史记》了。

①③ 孔颖达：《毛诗正义》，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93、47页。

② 杜预：《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079页。

笔者通过对《毛序》(集中在《国风》)联系史实论《诗》内容的考察,发现有一部分《毛序》所联系的史实,不见于《史记》而仅见于《左传》;另一部分《毛序》所联系的史实,既见于《左传》,也见于《史记》。故分而述之。

(一)仅见于《左传》而不见于《史记》者

例一,《左传·成公二年》载:楚共王即位,要发动一次对鲁国的战争,派巫臣到齐国,告诉出兵的日子。可是这个巫臣“尽室以行”,即把家室财产都带上了。这时有个叫申叔跪的人要到郢都,路遇巫臣,说:“异哉!夫子有三军之惧,又有《桑中》之喜,宜将窃妻以逃者也。”^①所谓“有三军之惧”,指对将要发生的战争有忧惧之心;而所谓“《桑中》之喜”,是指“窃妻以逃也”。《桑中》见《鄘风》,其《毛序》曰:“刺奔也。卫之宫室淫乱,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窃妻妾,期于幽远,政散民流而不可止。”^②《左传》说“窃妻以逃”;《毛序》说“相窃妻妾,期于幽远”,内容上有内在的联系。

例二,《左传·闵公二年》:“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③《清人》见于《郑风》,其《毛序》曰:“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顾其君,文公恶而欲远之,不能,使高克将兵而御狄于竟。陈其师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众散而归,高克奔陈。公子素恶高克进之不以礼,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国亡师之本,故作是诗也。”^④有关《清人》的史实,《史记》无载;而《左传》记载了事情的始末。《毛序》所联系史实,与《左传》同。

例三,《左传·闵公二年》:“初,(卫)惠公之即位也少,齐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生齐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⑤《毛序》的作者结合这段史实来解释《鄘风·墙有茨》,其

①③⑤ 杜预:《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655、225、223页。

②④⑥ 孔颖达:《毛诗正义》,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46、70、15页。

《毛序》曰：“卫人刺其上也。公子顽通乎君母，国人疾之，而不可道也。”^⑥昭伯，也即公子顽，为惠公庶兄，宣公之子。事情的原委是，卫宣公死，其子朔在齐国人的帮助下立为惠公。可是惠公年少，考虑到齐国在卫国的长远利益，所以齐国人强迫惠公的庶兄昭伯也即公子顽与宣公之妻宣姜发生性关系，昭伯开始不同意，最后还是同意了，结果生了齐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这是卫国宫廷中的一段秽事，此事在《史记·卫康叔世家》中没有记载；而《毛序》联系《左传》所记，用于解释《卫风·墙有茨》。如果说《毛序》的作者没有见过《左传》而仅根据《史记》，这种现象就很难以解释。

(二)既见于《左传》，又见于《史记》者

该类情况比上述一类情况要复杂得多。上类诸例，既然《毛序》说《诗》用以联系的史实于《史记》中无载，而在《左传》中有载，当然就能很直接地证明《毛序》的史实取自《左传》，当然也就是在《史记》之前，《毛序》已经基本完成的证明。而该类情况的复杂在于，《毛序》所用以联系说《诗》的史实，既见于《左传》又见于《史记》，如何判断其是依据的《左传》而不是依据的《史记》呢？办法还是有的，这就是特别要注意《毛序》所用的史实，用《毛序》所用的史实与《左传》、《史记》所记载的史实进行仔细的比照，来看《毛序》的写作究竟是依据的《左传》，还是依据的《史记》。其比照、考证虽然繁琐，但有利于加深对问题的认识。

例一，《毛序》解说《邶风·定之方中》，联系了一段卫国遭外侵国家动乱的史实，曰：“《定之方中》，美卫文公也。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处漕邑，齐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公室，得其时制，百姓说之，国家殷富焉。”^⑦《毛序》讲到了卫国遭狄人进攻而国灭，先是在漕邑立国，后又在齐桓公的帮助下，在楚丘复国，并建立宫室。并认为诗为美卫文公而作。这段概

① 孔颖达：《毛诗正义》，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47页。

括性很强的史实,在《左传·闵公二年》有详细记述。如:闵公二年,“及狄人战于莒泽,卫师败迹,遂灭卫”;“狄人卫,遂从之,又败诸河”;“宋桓公逆诸河,宵济……立戴公以庐于曹”;“齐桓公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僖(公)之二年,封卫于楚丘”。^①《毛序》所说史实的过节与《左传》完全相同。至于《序》以为美卫文公而作,当与同样为《闵公二年》所记“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有关。

关于《毛序》所涉及到的这段史实,《史记·卫康叔世家》也有记述,但其记述的重点在卫君世次的变化,至于《毛序》所涉及的事件,有的就不见了。《毛序》所言“东徙渡河,野处漕邑”,在《左传》中为“宋桓公逆诸河,宵济……立戴公以庐于曹”;而《史记》载:“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谗杀太子伋代立至于懿公,常欲败之,卒灭惠公之后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顽之子申为君,是为戴公。”^②这段记载很明显地没有了《左传》“宋桓公逆诸河,宵济,……立戴公以庐于曹”的情节;也没有《毛序》“东徙渡河,野处于漕”的情节;而且,立戴公者成了卫的“百姓大臣”。这样比较之后,如果不存偏见的話,《定之方中》的《毛序》应该是依据《左传》的史实写成的,而不可能是未见《左传》而仅依据《史记》而写成的。

例二,春秋时代,齐襄公与鲁桓公夫人文姜淫乱之事,在齐、鲁两国上下都产生了较大的反响。《诗·齐风》有四首诗的《毛序》直接讲这件事:

《南山》诗《毛序》曰:“刺襄公也。鸟兽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恶,作诗而去之。”^③

《蔽笱》诗《毛序》曰:“刺文姜也。齐人恶鲁桓公微弱,不能防

① 杜预:《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22~223页。

②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594页。

③ 孔颖达:《毛诗正义》,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84页。